

第1章

绪论

社会语言学被认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然而，即使是一个分支，由于社会语言学具有“交叉学科”“经验学科”（祝畹瑾，2013）的特点，它所包含的内容也非常广泛。根据王春辉（2019）对社会语言学在我国70年发展历程的综述，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语言学所涉及的研究课题就包括语言与性别、语言变异与演变、双语/双方言与多语、语言与认同、法律语言、语言社区理论、城市语言调查、语言濒危与保护、网络语言、话语分析、语言态度、新媒体语言、语言服务、语言景观、语言能力、语言资源、地名/人名、外来词、语码转换、农民工/流动群体/特定群体的语言、语言接触、会话互动、新词新语、语言政策与规划等。如此繁多的研究课题囊括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一方面表明社会语言学所倡导的将语言运用与其所处的社会语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理念日益获得学界的认可，另一方面也表明社会语言学面临着郝奇和克瑞斯（Hodge & Kress, 1988）指出的一个危险，即沦为索绪尔所称的接纳语言系统之外的任何研究问题的“垃圾箱”。

显然，我们应该避免后一种情况的发生。在这本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著作里，我们将努力阐明，社会语言学是一门系统研究语言与社会关系的学问，它有着区别于其他语言学分支学科的特征，也有着非常明确的研究课题和内容。就其区别性特征而言，最为明显的是，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原则与占据20世纪语言学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有着根本不同。结构主义语言学，体现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Saussure, 1916/2001）之中，其关于语言的认识是基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想，采取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这一

封闭系统，而不是实际使用的语言片段。与此不同，社会语言学关注社会生活中实际使用的活生生的语言，它们的流动性以及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特征使得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发现具有特殊性，这也使其从具体研究中归纳出的理论具有小理论的特征，与结构主义语言学自身标榜的普遍性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关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课题，最为普遍的观点是，社会语言学以探究语言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各种联系为己任。例如，杨永林（2000）和高一虹（2001）在国内引进的一些社会语言学著作的导言中就曾指出这一点。社会语言学关注和研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使用的活生生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课题非常广泛，也导致对各种各样的语言运用形式和特点进行描述一度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主要内容。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社会语言学不需要聚焦理论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社会语言学观察和研究实际使用的语言是为了探索语言与社会之间的种种关系，包括制约这些关系的各种社会因素及其规律。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样社会语言学才不至于沦为索绪尔所称的“垃圾箱”（Hodge & Kress, 1988: 17）；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认识到社会语言学对于语言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价值。

基于以上关于社会语言学的基本认识，本书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论述将围绕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主线展开，认识“语言”“社会”分别在变异社会语言学、互动社会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中的不同含义，探索这些社会语言学流派关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认识，以及这些不同认识如何构成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与社会关系认识的发展和变化，进而认识社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 21 世纪的最新发展，以及社会语言学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昭示出来的一些规律性问题。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一章我们从社会语言学的起源入手，在整体上勾勒出社会语言学在国内外的发展轨迹，凸显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近几年关注的研究课题、采用的工具性概念以及提出的理论观点，为后续各章节深入探讨社会语言学的不同理论和方法、阐释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奠定基础。

1.1 社会语言学探源

关于社会语言学起源的问题，许多著作、文集和文章都有所论及（如 Calvet, 2003; Shuy, 2003; 赵蓉晖, 2003, 2009; 张兴权, 2005; 祝畹瑾, 2013）；但是，由于考察的视角不同，也存在多种不同的认识。下面我们基于最近的相关论述（李葆嘉, 2020; Heller & McElhinny, 2017）讨论两种关于社会语言学起源的不同认识，目的并非在于评判或者统一这些认识，而是通过讨论形成这些认识的方式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理解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学科和一门学问所承载的关于语言与社会之间联系的特定理念。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起源存在不同认识在学界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些不同认识彼此争论也可促进学术的发展；同时，我们也认为，不同的认识都基于一定的方法和理念，而对于这些方法理念乃至形成不同认识的方式进行讨论，更具有启示意义。

1.1.1 基于文献考据的探究

基于文献考据对社会语言学的起源进行探究，采用的是“考据—归纳—推阐”方法，通过挖掘、辨析和展示原始文献，将相关文献分门别类，进而做出一些有依据的推断。基于这一方法，李葆嘉（2020）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认为当下关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和主张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半叶。例如，他引用的英国语文学家赛斯（Archibald Henry Sayce, 1846—1933）1875年出版的《比较语文学原理》中就有这样的论述：“语言是社会的，不是个人的，语言既诠释了过去的社会，同时又被现在的社会诠释”（Sayce, 1875: 21, 转引自李葆嘉, 2020: 3）¹。李葆嘉考据了波—俄语言学家博杜恩（Baudouin de Courtenay, 1845—1929）、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Michal Jules Alfred Breal, 1832—1915）及其学生梅耶（Antoine Meillet, 1866—1936）的一些著作之后，认为社会语言学在19世纪后半叶就在西方形成了他所称之为的第

1 本书注重引用一手文献，只有在无法查到一手文献的情况下才使用转引文献。特此说明。

一代学说，其特点包括吸收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强调语言是社会事实、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语言的变化等思想。在此基础上，李葆嘉（2020）进一步推断，这一时期的社会语言学已成为“语言科学”，是“社会—心理学或社会科学”。

接下来的20世纪上半叶在李葆嘉（2020）的研究中属于西方社会语言学的第二代。在这一时期，法国、苏联、英国的学者相继提出并使用“社会语言学”或“语言社会学”的术语，出现了社区语言调查、城市方言调查以及社会语言学和民族学的结合。根据李葆嘉（2020）的文献挖掘和辨析，1909年，法国学者格拉塞列（Raoul de La Grasserie, 1839—1914）在德语期刊《社会学月刊》发表论文《论语言社会学》，首次使用“语言社会学”这一术语为这门学科定名。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把语言社会学视为民族社会学的重要分子，强调语言本质上是社会的，并通过论述社会与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构建语言社会学框架。次年，即1910年，法国语言学家道扎特（Albert Dauzat, 1877—1955）在《语言的生命》一书中提出“社会语言学”的术语，并讨论社会语言学的若干问题和研究内容，如语言的演变、语言之间的语言竞争、语言边界的移动等。在稍后的1928年，苏联语言学家波利万诺夫（Евген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Поливанов, 1891—1938）在《东方大学语言学引论》中提出“社会语言学”“社会方言学”的研究任务，认为应该考虑语言与经济生活事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群体背景下描述语言等。同年，苏联的另一位语言学家拉林（Борис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арин, 1893—1964）发表题为《关于城市语言的特点》的论文，提出了“城市语言生活”“城市社团”“城市方言”“城市方言学”和与之相对的“乡村方言学”等术语。除了法国和苏联的学者以外，在这一时期提出并使用“社会语言学”相关概念和术语的学者还有英国的弗斯（John Rubert Firth, 1890—1960）。李葆嘉（2020）认为，英国语言学家使用“社会语言学”这一术语最早是在1935年弗斯发表的论文《语义学技艺》中所说的“社会语言学是未来研究的重大领域”。尽管如此，李葆嘉认为，英国学者撰写的第一篇社会语言学论文为霍德森（Thomas Callan Hodson, 1871—1953）所作。这篇文章发表在《印度人》上面，题为《印度的社会语言学》，发表时间为1939年。

西方第三代社会语言学始于 20 世纪下半叶，主要集中在美国。在李葆嘉的文献辨析中，美国语言学的先驱辉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1827—1894）在其《语言的生命与成长》（1875）中认为个体给语言带来的每一变化必须受到社区的批准，而且只有在适合总体性语言框架的情况下才能接纳。这一主张应该得到发扬光大，但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1887—1949）的描写主义语言学在美国盛行的背景下，辉特尼的观点并未能在美国开枝散叶。直到 1950 年 12 月 29 日，美国语言学会新任主席豪根（Einar Haugen，1906—1994）在例行年会上发表题为《现代语言学的方向》的就职演讲时才提到“社会语言学”这一术语。但是豪根也只是把“社会语言学”看作是研究语义的学科（李葆嘉，2020：27）。两年之后，1952 年，时任休斯顿大学助理教授的柯理（Haver C. Currie，1908—？）发表《社会语言学预测：言语与社会地位的关系》一文，为研究语言各方面的社会意义提供了新起点。这被认为是美国社会语言学的宣言（李葆嘉，2020）。1953 年，瓦恩里希（Uriel Weinreich，1926—1967）出版《语言接触：发现问题》一书，奠定了美国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之后，其学生拉波夫（William Labov，1927—）促使美国社会语言学走上前台。

李葆嘉关于他所称之为西方三代社会语言学的文献挖掘和辨析，集中体现在“社会语言学”及其相关术语的使用上面。他甚至还列出了“社会语言学 / 语言社会学”及其相关术语自 1889 年至 1956 年在文献中出现的年代表（见表 1-1）。

表 1-1 文献中出现的“社会语言学 / 语言社会学”及其相关术语（李葆嘉，2020：35）

序号	（国籍）学者	年份	术语
1	（波—俄）博杜恩	1889	语言科学是心理—社会科学 （ что языкознание—наука психологично-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
2	（法国）梅耶	1906	讲言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la linguistique est une science sociale ）
3	（法国）格拉塞列	1909	语言社会学（ sociologie linguistique ）
4	（法国）道扎特	1910	社会讲言学（ linguistique sociale ）

(续表)

序号	(国籍) 学者	年份	术语
5	(苏联) 波利万诺夫	1928	社会语言学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社会方言学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я)
6	(苏联) 拉林	1928	社会语言学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语言社会学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социологии) 城市方言学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и города)
7	(英国) 弗斯	1935	社会语言学 (sociological linguistics)
8	(英国) 霍德森	1939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9	(美国) 巴尔内斯等	1940	语言的社会学 (sociology of language)
10	(法国) 柯恩	1948	社会和语言研究 (recherches sur société et langage)
11	(美国) 奈达	1949	社会语言环境 (sociolinguistic environment)
12	(美国) 豪根	1950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实指社会语义学)
13	(英国) 皮里斯	1951	语言的社会学方法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14	(美国) 柯理	1952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15	(法国) 马尔丁内	1952	社会语言模式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社会讲言情景 (socio-linguistic situations)
16	(美国) 赫兹勒	1953	语言的社会学 (sociology of language)
17	(美国) 瓦恩里希	1953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sociolinguistic)
18	(法国) 柯恩	1956	语言社会学 (sociologie du langage)
19	(美国) 沃利斯	1956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这种文献挖掘、辨析、梳理、分类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推断的研究方法与当下国内学界运用 Citespace 技术综述研究现状的方法有相似之处, 如穆军芳 (2016) 就是运用该技术对国内批评话语分析在 1995 年至 2015 年间发展进行综述。这个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全面地审视相关文献, 如可以发现高产作者和机构都是谁、哪些关键词可以体现研究热

点等。但是，其不足也比较明显，如李葆嘉（2020）的研究所示，一些文献并非是因为有“社会语言学”这个术语就可以被定义为社会语言学研究，何况有些文献中还未曾出现“社会语言学”及其相关术语。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虽然梅耶强调语言的社会特征，但是他从未使用过“语言社会学”“社会学的语言学”“语言社会学”或“社会语言学”一类的术语表达自己的观点（Calvet, 2003）。更进一步看，在没有对什么是社会语言学作出明确定义之前，只凭“社会语言学”这几个词出现与否就认定该文献属于社会语言学的第几代，会使讨论的问题更加模糊。可见，只观察文献中是否出现相关术语并就此推断西方社会语言学的起源并划定社会语言学的三个阶段，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至少这种探究社会语言学起源的方法还没有考虑到社会语言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在这方面，海勒和麦克林尼（Heller & McElhinny, 2017）关于社会语言学起源的讨论值得借鉴。

1.1.2 基于社会语境的探究

海勒和麦克林尼在她们的著作《语言、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一个批评性历史》的第7章专门讨论社会语言学的起源。她们认为，社会语言学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新命名”的领域，其奠基人是拉波夫、甘柏兹（John Gumperz, 1922—2013）和海姆斯（Dell Hymes, 1927—2009）。在提出社会语言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这个观点之后，她们将这个学科之所以“新”的原因归纳为两点。一方面，社会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将语言学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的手段，这在广义上是社会科学为解决发展中遭遇的国际国内社会问题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社会语言学之所以“新”也是因为它是与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使用语言的方式和传统决裂的一种手段，这是那个时代所体现的致力于重塑战后世界的现代主义和进步精神的一部分，这种精神也是对那些被广泛认为是一场革命并具有深刻影响的转换生成语法的一个直接回应（Heller & McElhinny, 2017: 240）。

可见，社会语言学的起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在海勒和麦克林尼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避免再次遭遇大萧条带来的那种经济浩劫和可能导致战争的国家间竞争。为此，需要重建国家经济和国际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殖民地国家的“发展”和“去殖民化”两个方面。发展即是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去殖民化则是摆脱老牌帝国的政治统治和重建民族国家。对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提供了大量的资助，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都参与进来。语言学家也参与其中，在国家语言的确定、多语问题的规范、教育中的语言使用、语言教育以及提高民众的识字能力等方面为国家决策和制定政策提供服务。尽管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的另一方，苏联及其盟国也致力于殖民地国家的发展与去殖民化，海勒和麦克林尼认为，美国在全球的新霸主地位促成了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美国的出现。这方面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甘柏兹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在印度的工作。

那时的印度刚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经济发展和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印度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作为一个美国的方言学家，甘柏兹在印度的工作就是研究这些多语问题，而这些语言的变异性也使甘柏兹和他的同事有兴趣进一步探讨语言、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跨社会和跨地区的问题。一面是各种语言变体，一面是种族、宗教、阶级、性别造成的社会区隔及其各种形式，二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二者通过什么方式联系，这些问题也使甘柏兹越发对社会语言学感兴趣，同时也使甘柏兹认识到，从这个视角观察到的区别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各种生活机遇确实可以产生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甘柏兹在印度的工作构成了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出现的社会语言学这一新学科的基础（Heller & McElhinny, 2017: 238）。

除了甘柏兹，拉波夫和海姆斯被认为是美国社会语言学的奠基人也是因为他们的经历和研究与当时的“发展”“去殖民化”社会现状紧密相关。例如，海姆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造成的巨大灾难震惊不已，同时，他还作为语言人类学家在俄勒冈州温泉镇印第安保留地接受训练。这块保留地是美国人攻击土著人主权的产物，但是被当地称作瓦斯卡、特尼诺、佩尤特的三个部落共同占有和

管理，他们分别说克什特语、努姆语和伊希金语。同时，在这块保留地上还有一个区域说着一种类似贸易行话的洋滨腔。将海姆斯的这段人生经历与他后来进行的交际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研究联系起来，我们也会更加深刻地理解他为什么在交际民族志研究中特别重视交际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作用。

拉波夫的早期工作与青年动员组织赞助的一个大的项目相关。这个组织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主要致力于社区发展、消除贫困和防止、控制青少年犯罪。由于贫穷和歧视所导致的青少年犯罪在曼哈顿下东区的移民安置点持续了60年之久，以至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少年犯罪非常猖獗。对此，社会服务工作者非常关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也给予支持，福特基金会和国家心理健康研究院也给予资助。我们现在知道，拉波夫的变异社会语言学建立起语言变项[如(r)在floor这个单词中的发音]与社会变项(如性别、年龄、种族以及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共变关系(correlation)，但是，当我们发现他早期在社会服务组织中的工作内容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变异社会语言学所建立的这种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关系实际上体现出拉波夫的一种社会关切，即他后来提出的一个主张：非洲裔的美国学生不是因为沒有掌握好被称为“标准英语”的语言而学业成绩不佳。他这样讲，实际上是提倡非洲裔美国人讲的英语应该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一直呼吁非洲裔美国人的英语应该更多地被融进学校的课程之中(Heller & McElhinny, 2017: 255)。

根据海勒和麦克林尼的研究，社会语言学在美国成为一个新兴学科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新格局不无关系。这一时期，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原殖民地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成立民族国家之后，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其中就涉及众多与语言使用相关的语言政策问题，如重新界定官方语言问题、实施民族语言规范问题以及制定语言教育方针问题。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虽然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但是社会不平等问题非常严重，包括黑人英语被视为劣等语言的问题也成为明显的社会问题。在这一时期，美国依据其在世界事务中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包括美国财团不断的资金投入)，设立多个研究课题，吸引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专家参与研究，其中就包括在后来成为社会语言学家

的人类语言学家甘柏兹和民族志学家海姆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甘柏兹、海姆斯和拉波夫被海勒和麦克林尼认为是美国社会语言学的奠基人（Heller & McElhinny, 2017）。可以说，社会语言学也是在对社会生活中的语言状况进行田野调查和政策规范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当时的社会发展恰恰需要这种对混乱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规范，以服务于民族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的政治需要。

基于以上关于社会语言学起源的探讨，我们基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即社会语言学就其学科意义而言，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这一方面体现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之中，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学者对于当时的语言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之中。正如祝畹瑾（2013：3）指出的那样，当时的“社会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由此涉及的语言问题吸引了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奔赴各地考察，搜集第一手资料，写成了不少开拓性的学术论文”。这其中就包括甘柏兹在对印度北部进行实地调查基础上完成的《印度北部村庄里的方言差别和社会分层》，拉波夫基于纽约市哈勒姆区非洲裔美国人说土话的观察对黑人语言能力“缺陷论”的驳斥，以及海姆斯基于对社会底层儿童语言问题的研究提出“交际能力”的概念。所有这些理论见解，来源于社会语言学家对社会语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为社会语言学反对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的“语言能力”学说提供了理论支撑。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我们认为，学界普遍将“社会语言学”这一术语的起源定格在美国学者柯利（Haver Currie）1952年的论文《社会语言学投影——言语和社会地位的关系》不无道理。

1.2 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通过上一小节的讨论，我们认识到社会语言学的起源与语言学家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语言问题的回应相关。基于此，本小节关于社会语言学发展脉络的讨论也将围绕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展开，就国外和国内的社会语言学发展轨迹分别论述。我们认为，我国国情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国情存在巨大的差异，从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讨论社